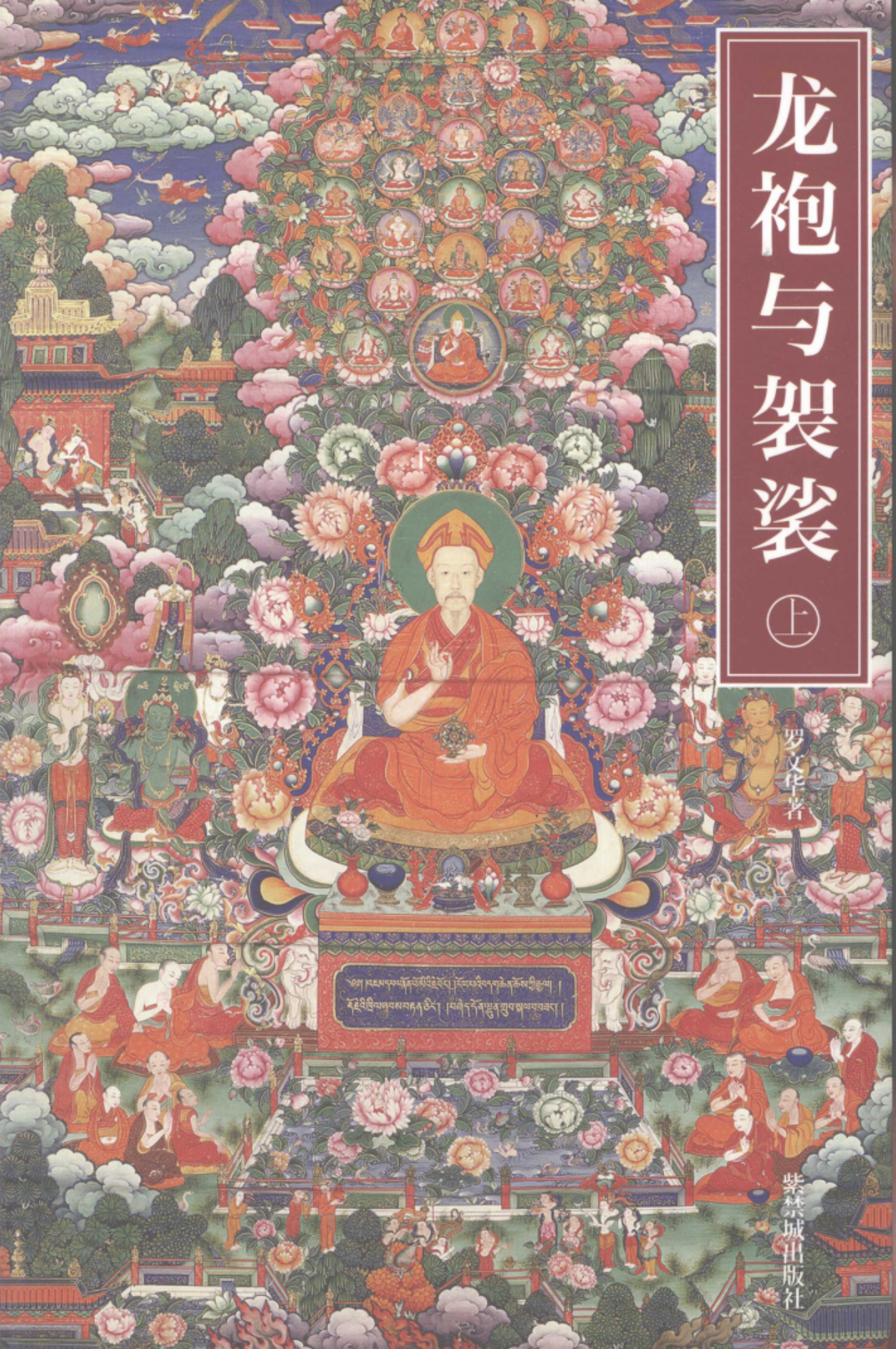


龙袍与袈裟

①

罗文花著

紫林城出版社





通过丰富详实的清宫档案

多姿多彩的宫廷藏传佛教文物

尘封多年的清帝私人佛堂

揭示藏传佛教在清代宫廷的真实面貌

剖析清帝个人的信仰世界和宗教追求

ISBN 7-80047-508-5



9 787800 475085 >

ISBN 7-80047-508-5/K · 249

定价：198.00元（上、下）

龙袍与袈裟

—— 清宫藏传佛教文化考察

罗文华 著

紫禁城出版社

目 录



清帝的藏传佛教信仰与治藏政策 004

第一章 万神殿：藏传佛教神系的成立与完善 030

第一节 印度佛教神系的形成与嬗变 031

第二节 西藏对佛教神系的引进与构建	053
第三节 清代宫廷对藏传佛教神系的最后完善	064
第二章 智珠心印：清宫佛堂解析	076
第一节 故宫雨花阁藏密神系及其密宗四部思想	077
第二节 雨花阁唐卡	096
第三节 清宫六品佛楼	127
附 录 清宫佛堂文献摘录	246
第三章 空与幻的美：佛教造像艺术	276
第一节 故宫藏斯瓦特风格铜造像	277
第二节 故宫藏喀什米尔风格铜造像	292
第三节 西藏古格那嘎拉咱王及其铜造像	313
第四节 故宫藏喀尔喀蒙古铜造像	324
第五节 清宫藏传佛教造像	343
附 录 清宫佛教造像档案摘录	436
第四章 线条与色彩：佛教经典中的绘画	458
第一节 明人书内府金藏经	459
第二节 乾隆时期宫廷藏传佛教绘画	483
附 录 清宫佛教绘画档案摘录	547
第五章 感性与理性：清代宫廷佛教史拾零	554
第一节 清代驻京喇嘛管理机构	555
第二节 乾隆九年尼泊尔工匠进京考	583
第三节 满文《大藏经》编纂史略	599
第四节 乾隆时期满文阿礼嘎礼字	622
附 录 清宫佛教史文献摘录	647

清帝的藏传佛教信仰与治藏政策

一 信仰：清帝面临的双重角色

近年来，清宫史和清代宫廷藏传佛教成为逐渐升温的学术研究方向，也成为越来越多人感兴趣的话题。但是，与学者们不同的是，大众对此题目的关注往往带有探寻居住在高墙深宫内的皇帝后妃们隐私的倾向，例如，皇帝个人是否真的有藏传佛教的信仰？或者，他们对于藏传佛教信仰更多一些，还是对于汉传佛教信仰更多一些？清代皇帝亲修秘法吗？他们修秘的地方在哪里？这些令人难以作答的问题的提出，虽然与时下社会各种媒体宣传有关，但不可回避的事实是，这些提问所包含的一些实质的确触及到清史和清宫史研究的核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学术界在这些敏感的问题上显得相当谨慎，有时，学者之间观点完全对立，令人无所适从。例如，清代皇帝，如乾隆帝，是否真的对藏传佛教有信仰？抑或仅仅是一种政治的作秀？持正反意见的学者们都能拿出有力但并不全面的史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种争论的结果只能是各执己见，不了了之。

解答上述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面对宗教信仰的问题时，每一位皇帝都不得不扮演双重角色，即：作为一个个体，他必然会对某种宗教信仰带有个人色彩

的倾向，同时由于其特殊身份和地位，他又必须完成宗教信仰的政治行为。这是帝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由于中国传统社会并不是由政教合一的皇权来统治，也就是说皇帝个人信仰与帝国的宗教政治行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差异性。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关乎帝国的稳定与统一。

从藏传佛教大规模影响到汉地的历史来看，元代，萨迦派国师（图1）驻大都，权倾天下，骄奢无度，皇帝将其个人的信仰与国家政治完全统一，失之过纵。明代，不少的西藏高僧在北京居住（图2），作为皇帝的使者和修行导师，对于朝廷安边政策贡献虽大，但靡费颇巨，故朝野的非议颇多。加之，各位皇帝对于佛道信仰摇摆不定，造成政策的不稳定，随意性很大，失之太宽。清代，只封过青海章嘉系统的国师一名，尊崇格鲁一派，即已安定内外蒙古；其余驻京呼图克图奔走效命，如同朝臣，在宗教上并不过分限制，而是着力提倡，恩



图1 元代第一位帝师八思巴像



图2 法源寺保存的明代驻京藏族高僧班丹札什像

威并施，其靡费不足以耗伤国力，其尊僧不致使其骄纵，开疆拓土，天下安定，足见清代安边政策之成功。尤其是清帝个人在对待信仰的问题上总是隐而不彰，不动声色，鲜有因为个人信仰的变化影响国政的情况出现，足见其施政理性程度之高。这也是满族一个小民族，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众多民族的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清帝这种理性的政治态度，导致清史学家和清宫史研究者之间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视角来观察他们，从而得出了相左的结论。

如中国社会传统所要求的，皇帝的神圣职责就是必须当一个最有权威的明君，他所受的知识教育和作为一切行为规范的礼制教育均是为了使他有能力将他的帝国统治好。他的个人情感和宗教信仰都要合乎作为一个皇帝的行为标准，否则容易受到朝野的非议，甚至受到大臣们的强烈批评。所以在官方的正史中

所见到的都是皇帝正面的记载，或学习和阔论儒家的修身治国思想，或忧国忧民，或者处理军国大事，而对于个人生活则鲜有涉及，很少能见到有关皇帝私生活的记载。但是脱去龙袍之后，在休闲之中，他回到一个平常人的状态，总要在个体世界中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追求自我的精神归宿，也就是说，他必须有自己个人的信仰要求（图3）。当这种信仰与国家政策不尽一致时，他的信仰就成为史官们笔下必须谨慎对待的问题，千方百计为之避讳。即便他的信仰与国家推崇的宗教（佛教或道教）一致，还有一个尺度把握的问题。很多皇帝个人信仰的活动往往打着国家的名义，或者以政治需要为借口，大行其事，但是对于今天的学者而言，二者之间该如何区分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哪些活动是他自己的信仰，哪些又是政治的策略？或者，什么时候皇帝的虔诚是可信的，什么时候只是一种政治姿态？什么时候又是兼而有之？

笔者以为，即便是皇帝本人在世，他也会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到为难：政治家和信徒之间的界限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要把握很准确绝非易事。所以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皇帝，标准之一就是要做到准确地把握政治家和信徒的双重角色，并熟练地在两种角色之间转



图3 康熙帝持念珠画像

换。若尽据正史，可能会得出一个很正面的结论；完全依据野史，又容易因道听途说而误入歧途。但有一些资料是我们研究不可忽略的，即当时大臣们的一些笔记、一些外国使臣们的日记以及其他民族文字（如藏文、蒙文等）的史书资料，它们保存了一些相当真实的描述，尤其当他们在与皇帝接触时所记录下来内容远比正史要生动精彩得多，而且多记录一些小细节，大事往往略而不录。这样的记载更容易让我们看到清帝们对宗教的真实态度。还有，保存下来的大量内务府档案，这些档案虽然枯燥，但其内容却是对皇帝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根据这些流水簿式的文字，我们往往可以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

总之，正史的记载更像是皇帝的政治大事记，对于个性化的皇帝生活并没有很多的记载，甚至有意为尊者讳。其中所表现的皇帝信仰更多的是政治作秀，或者是职责使然，与他本人的信仰并无直接关系，据以论皇帝的个人信仰无异于缘木求鱼；相反，其他非正史的史料以及内务府的档案资料更能表现出一个真实个性化的皇帝，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记载中，有些是他纯个人的行为，这时他的信仰活动可以肯定大部分都是他个人信仰的真实写照。若据以证皇帝对宗教的政治态度也难免一叶障目。

如果这样的结论太过抽象的话，我们试以具体案例来说明他们对藏传佛教的政治行为与个人信仰两个方面的微妙把握。

二 具缘弟子：乾隆帝的佛堂与修密

谈到清代诸帝的信仰最有代表性的是前四帝：顺治帝、康熙帝、雍正帝和乾隆帝。顺治帝对汉地禅宗沉溺很深（图4），曾一度落发欲出家，自许前世因缘当为和尚^{〔1〕}。但这并不妨碍他于顺治九年（1652年）迎请五世达赖喇嘛来京朝觐^{〔2〕}，此举不仅一举确定了北京与西藏的君臣关系，怀柔了北方喀尔喀蒙古

〔1〕 陈垣撰：《陈垣学术论文集》页482—531，中华书局，1980年。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著，陈庆英、马连龙、马林译：《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西藏卷·五世达赖喇嘛传·云裳》上册，页327—346，中国藏学出版社，1997年。



图4 清世祖所设宫中佛堂万善殿外景

势力，更推动了藏传佛教在京畿地区的繁荣。康熙帝早年英气豪发，纵横天下。中年后，由于废立太子事的打击以及健康状况不佳，对于佛教的信仰也日渐增加。他从四十年开始，每月朔望抄写心经各一遍（图5），从未断过，即使身体不适，康复后也多抄补上^{（1）}。时与高僧探讨佛理，叹为玄识^{（2）}。在藏传佛教方面，他与喀尔喀蒙古第一高僧哲布尊丹巴私交甚笃，二人的交往时间超过10年。康熙帝去世后，哲布尊丹巴不顾高龄，亲来吊丧，不幸逝于北京。据蒙古文哲布尊丹巴的传记记载，康熙帝曾在他的面前受戒，亲受长寿之秘法及长寿佛之



图5 康熙帝御笔《心经》 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故宫旧藏

（1）《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全编》第一册，页1—3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2）喻谦撰：《新续高僧传四集》卷二，《清蒙古多伦洮汇宗寺沙门释克传》页791，《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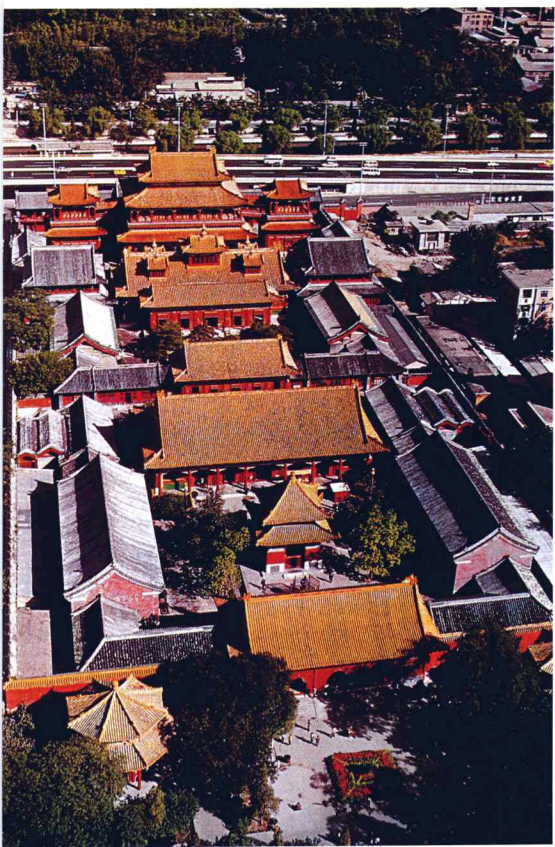


图6 雍正帝藩邸雍和宫全景

灌顶，对他的评价极高：“未见有喇嘛可与哲布尊丹巴可比者。”⁽¹⁾雍正帝较其父更有过之。他对于汉地禅宗、西藏密教以及道教均有浓厚的兴趣，并身体力行。有关他对于汉地禅宗的造诣已经有了很多的学术成果，不遑多论，他本人不仅有很多著述，而且自述在宫中与兄弟、儿子、亲信大臣、道士等人举行法会的经过⁽²⁾。他不仅令道士在宫中炼丹药，而且让道士们在宫中多建斗坛为他祈寿祛病，或直接为他治病。有人怀疑他的暴死与服丹有关⁽³⁾。他对藏传佛教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因为当他还在藩邸为皇子时，就曾修行密法（图6），其指导上师是二世章嘉国师阿旺洛桑却丹，自称得“大自在”的成就⁽⁴⁾。

(1) 申晓亭、成崇德译注：《哲布尊丹巴传》页219—235，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辑的《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88年5月。

(2) 清世宗编：《御选语录》卷一九，《当今法会·御制序》，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521—522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

（清）萧爽撰：《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永宪录续编》页358，中华书局，1997年。

(3) 冯尔康著：《雍正传》页452—453，547—548，人民出版社，1985年。

(4) 清世宗《御选语录》卷一八《御制后序》，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521—522册，海南出版社，2001年。

到乾隆时期，清室整体对于宗教信仰已经没有前期的拘束，反而成为一种时尚。乾隆帝本人就是一个很鲜明的例证。下面我们主要以他个人信仰行为说明清帝在对待藏传佛教信仰时所采取的私人色彩的做法。

关于乾隆帝的信仰问题，所有的人必须面对如下的事实：乾隆帝在紫禁城中的卧室养心殿西暖阁（即著名的三希堂）后面设有一处完整的藏传佛教佛堂（图7），中心供奉五方佛，四周围绕着藏传佛教几大本尊：密集金刚、上乐金刚、大威德金刚和喜金刚为主题的空间，佛堂正中矗立着一座无量寿佛木塔。这种佛堂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含义，因为这里是乾隆帝的隐秘场所，除了他可能会在这里与他的上师举行一些个人色彩的密教修行活动之外，没有任何外人会进入这个空间，显然可以排除政治作秀的可能，基本可以肯定这里是他个人佛教活动场所。

还有一个例子与乾隆帝有关。根据内务府《穿戴档》的记载，乾隆帝每年只在宫中居住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其余大部分时间在圆明园。每到年终岁末或临时有大型祭祀和节庆活动，他才会返回宫中。但即使是在宫中短暂的时间内，他总是要到建福宫花园内坐一坐，在这里接待喇嘛高僧。建福宫花园是乾隆帝即位后最先修建的花园，其中满布大小佛堂，这里也是皇帝的私人活动区，不



图7 养心殿内佛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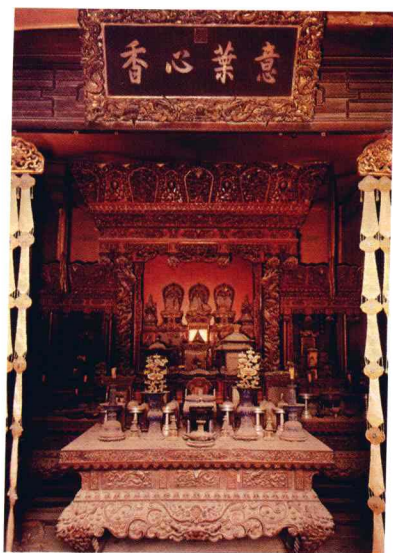


图8 崇敬殿东佛堂

是政治活动区，很少有外人进入；其东面紧邻着他当皇子时居住的重华宫。有意思的是，重华宫前殿崇敬殿内还保留着两处佛堂（图8），这些地区同样可以看做是为他信仰需要而设的佛堂；南边是宫中藏传佛教的核心地区中正殿一区；东南离开他的住所养心殿也不远。根据藏文文献章嘉国师传记的记载，乾隆帝曾要求在章嘉国师面前听受各种秘法，章嘉国师欣然同意，并指导他先学习皈依法，学习藏文的书面语，待通达藏文认读之后，学习显宗入门教义《菩提道次道论》。当一切条件成熟之后，他在章嘉国师的面前亲受上乐金刚的灌顶。

据说在他准备接受灌顶的前一天晚上，曾在宫中听到章嘉国师在寺中念诵七字咒语的声音。章嘉国师的寓所在紫禁城外东北角的嵩祝寺（图9），与紫禁



图9 嵩祝寺现状

城相望。虽然这种记载有夸张的成分,但至少说明乾隆帝接受灌顶的地点应在北京,至于是在宫中某个佛堂,或者如有些学者所认为的在雍和宫⁽¹⁾则难以确定。不过不太可能是在养心殿,毕竟养心殿佛堂内空间狭小,不适于作为灌顶仪式之场所。另外,也不太可能是在中正殿一区,因为灌顶毕竟是一种小型规模的秘密佛事活动,相对而言,中正殿一区是宫中的藏传佛教管理区、艺术创作区、法事活动区,每天有很多的喇嘛、喇嘛工匠、管理人员及太监等人在此活动,显得过分热闹了。

乾隆帝接受灌顶的时间应是乾隆十年(1745年),这一年他35岁。仪式中,章嘉国师坐在高高的上师台上,乾隆帝跪在低的座垫上,一直到整个仪式结束。完成之后,他恭称章嘉为“金刚阿闍黎”(密教上师)。此后,不断坚持听闻修习众多密法,而且每月初四日都要举行坛城修供。这条记载在清宫档案中得到印证。《中正殿呈稿》中记载:在圆明园西北角的清净地,每年的四月初二日至十日都要举行唵诵上乐王佛经的活动,绘画坛城⁽²⁾。清净地有藏传佛教的都罡大殿,内部陈设200多幅中正殿喇嘛工匠绘画的藏传佛教唐卡,这里每年都有频繁的藏传佛教佛事活动举行。它的东边还有一座法源楼,是他礼佛休息的场所(图10)。此处于乾隆二年(1737年)修建而成,早已经成为圆明园重要的道场之一。由于清净地是清官藏传佛教上乐金刚的道场,我们不禁会联想到:这里是否才是乾隆帝灌顶的场所呢?

无论如何,乾隆帝受灌顶是在宫中或是雍和宫或是圆明园都还是一个谜。

章嘉国师的记载中,乾隆帝完全是以一位虔诚的佛弟子出现的,他甚至对其他在场的喇嘛称密法师兄弟。章嘉本人对此的评价十分有意思,他有意将他对于乾隆帝的灌顶与元代八思巴对蒙古皇帝忽必烈的喜金刚灌顶相提并论,暗示他就是八思巴的化身,乾隆帝就是忽必烈的转世⁽³⁾。显然,章嘉心目中元代帝师所曾获得的荣耀和崇高地位仍是他的梦想。但是乾隆帝是否

(1) 应当特别注意,雍和宫由王府改为藏传佛教寺院的工程正是在乾隆十年完成的,故有学者认为其灌顶仪式可能是与该寺的开光仪式同时举行的。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呈稿补遗》第12包,《中正殿念经处》。

(3)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陈庆英译:《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页181—185,民族出版社,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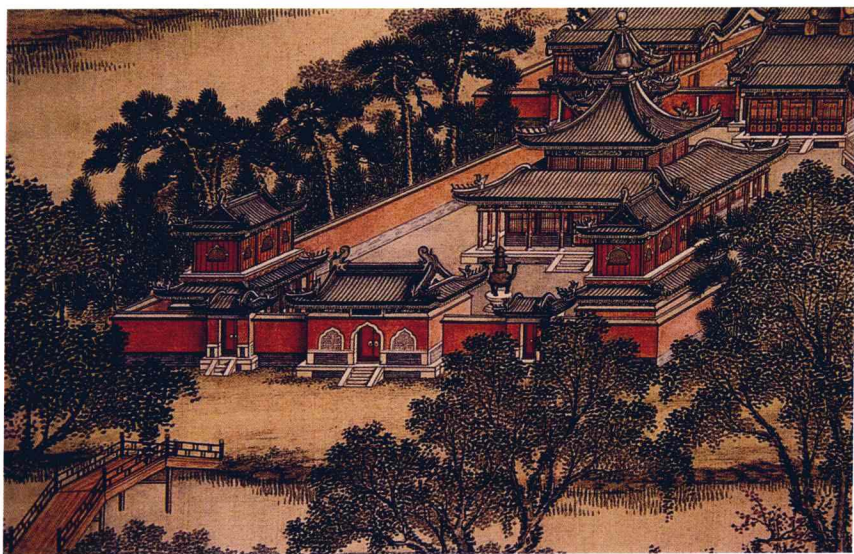


图 10 清净地一带分布图

认同这种角色的附会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乾隆帝不可能将藏传佛教的地位提升到元代的高度，章嘉也不可能像元帝师一样权倾天下。但是，从宗教的角度，即阿闍黎和金刚弟子的关系来看，二者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将这种亲密关系仅限在密教修习方面岂是章嘉的本意，他不会只为找到一个虔诚的弟子而倾心赞叹吧？二者之间对此事的理解存在着微妙的差距。

不管这种记载的可靠程度到底有多大，但至少从中可以想见，乾隆帝对于藏传佛教的涉入比我们想像的要深得多。据他晚年回忆：“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①。这并非虚言。正是由于这种很深的沉溺，增加了他掌握个人信仰与政治行为平衡的难度。

如果我们仅从乾隆帝是一位明君，就断言他对于个人信仰与政治需要两个角色的尺度把握得极为精当，丝毫不差，恐怕有点言过其实。从历史资料来看，他有时也很难从个人信仰的角色中超脱出来。

① 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辑：《西藏研究丛刊之九·清实录藏族史料》第七册，页 3549，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图 11 香山昭庙外景

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派画工入藏,测量和绘制布达拉宫、桑耶寺等建筑图样,为在北京等处仿照建设做准备;为清宫佛堂供奉的需要,三十一年(1766年)命驻藏大臣在西藏收购唐卡和铜造像⁽¹⁾,千里迢迢运回北京;又分别于乾隆九年(1744年)和三十二年(1767年)请来尼泊尔工匠和西藏工匠参加京城和宫中的藏传佛教建设⁽²⁾;乾隆二十年(1755年),从西藏召来舞蹈教习,由章嘉负责在宫廷中表演西藏的宗教舞蹈“噶尔”和“羌姆”⁽³⁾。这些事件很难明晰地将乾隆帝的意图一分为二,其实政治的利用与宗教情感的交织是乾隆帝最为真实的状态。他晚年尤其如此,甚至为此招来大臣的非议。如,四十五年(1780年),正值他70岁大寿,乾隆帝为迎接六世班禅来京朝觐祝嘏,从承德的须弥福寿之庙(或称:扎什伦布寺)和北京香山昭庙(图11)的兴建到对北京黄寺、雍

(1)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页173,第3124、3125、3133条(军机处满文录副);页174,第3142、3143、3156条,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2) 参阅:本书第五章、第二节:乾隆九年尼泊尔工匠进京考;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页175,第3173条,《军机处满文录副》,乾隆三十二年,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年。

(3) 陈庆英著:《章嘉若必多吉年谱》,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藏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